

漢字怎樣記音

黃 坤 堯

漢字是一種表意注音的音節文字，每一個漢字代表語言裏的一個音節。其字形結構以一半表意、一半表音的形聲字為最多，佔 80 % 以上。造字時，形聲字聲符也就是注音，即使不完全同音，起碼也符合了雙聲疊韻的原則，所以清人早就利用聲符來重建漢語的上古音體系。不過語言是逐漸演變的，現在很多形聲字的讀音與原來的聲符已經有相當的距離了。例如現代漢語從「寺」 si (4) 字得聲的字可以按聲、韻區別為六組（後注 1、2、3、4 代表國語四聲）：

- 一、zhi : 峙(4)、痔(4)、峙(4)。
- 二、chi : 持(2)。
- 三、shi : 詩(1)、時(2)、峙(2) [又音]、恃(4)、侍(4)。
- 四、dai : 待(4)。
- 五、deng : 等(3)。
- 六、te : 特(4)。

如果用粵音來表示，從「寺」 dzi (6) 字得聲的字仍然可以區分為六組（後注 1-9 代表粵語聲調），而略有不同。

- 一、dzi : 峙(6)、痔(6)。
- 二、tsi : 持(4)、恃(5)。
- 三、si : 詩(1)、時(4)、恃(5) [又音]、侍(6)、峙(6)。
- 四、doi : 待(6)。
- 五、deng : 等(2)。
- 六、dek : 特(9)。

國語沒有一組跟原來的聲符「寺」的讀音完全同音。粵語則只有第一組「峙」、「痔」等字跟聲符完全同音。根據周有光《漢字聲旁讀音便查》的統計，現代漢字聲旁的有效表音率是 39%（據《新華字典》1971 年版統計，只論聲、韻）。如果連聲調的因素也考慮進去，那麼兼有表調功能的聲旁只佔 17 % 而已。對現代漢字來說，聲旁的記音功能是相當微弱的；假如真的是「有字讀字，無字讀邊」的話，幾乎可以肯定一讀就錯。

漢代學者整理古籍的時候，發現語言和文字之間頗有距離，並不一致。這是古今音變的必然結果，造成了記音工作的困難，古代中國的記音工作大概可以分為下面幾個階段。

首先是譬況讀音，就是說明發音方法或解釋發音原理，指出一些讀音的特點。下列是一些比較著名的例子。

- (1) 《春秋公羊傳·莊公二十八年》：「《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故使衛

主之也。」何休注云：「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

- (2) 劉熙《釋名·釋天》：「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

又：「風，兗、豫、司、冀橫口合唇言之；風，汎也，其氣博汎而動物也。青、徐言風，蹶口開唇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

- (3) 《淮南子》高誘注云：「蛟，讀人情性交易之交，緩氣言乃得耳。（《原道訓》）」

又：「滯，讀延祜曷問急氣閉口言也。」（《假真訓》）

又：「瘞，讀人謂瘞然無知之瘞也，籠口言乃得。」（《地形訓》）

又：「埴，讀似望，作江淮間人言能得之也。」（《說山訓》）

又：「隣，讀近蘭，急舌言之乃得也。」（《說山訓》）

又：「隣，讀似鄰，急氣言乃得之也。」（《說林訓》）

又：「駘，讀似質，緩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脩務訓》）

例(1)何休長言、短言的區別主要說的是元音，還是聲調？我們不大清楚，何休只是根據他的直覺來說明齊人的「伐」字兩讀有別。例(2)劉熙描寫「天」字的聲母方言有別，所謂「舌腹」言之大約是指舌根擦音 [x-]，「舌頭」言之則可能接近舌尖中音 [t-]，主要是發音部位的差異。「風」字在不同的方言裏亦有不同的韻母，大概「橫口」說的是展唇的元音，「蹶口」則是圓唇元音，「合唇」是指唇音韻尾 [-m]，「開唇推氣」則是舌根音韻尾 [-ng]。高誘的一批例子比較麻煩，他跟很多前輩學者一樣，只是憑直覺來分析語音，而不解釋所用術語的準確含義，當時的讀者也許會明白他的意思，我們事隔二千年後，問無可問，只好也憑直覺來理解他的含義了。所謂「閉口」、「籠口」可能是指韻尾不同，一收 [-m]，一收 [-n]。「緩氣」、「急氣」的含義不詳，可能指洪音、細音，也可能指聲調；「急舌」一名疑誤，另一條作「急氣」可作參考。高誘有時又用「江淮間」等別的方言來說明通語所缺少的音素。

其次是直音。漢語是單音綴的語言，聲、韻、調的關係結合密切，不容易一下子分析出來，能夠用同音字去記音，當然是最便捷的方法了。然而這也不是甚麼萬應靈丹，有時無字可注，有時以深字注淺字，例如最淺的「一」字又該用哪些同音字去注呢？直音的前身大約就是漢人的「讀若」、「讀曰」、「讀如」、「讀近」、「讀爲」、「音×」等，許慎《說文解字》、鄭玄的羣經箋注以至史部、子部等的訓釋諸書都有大量的例證可供參考，不勞舉證。不過有一點要小心的，就是漢人的「讀若」、「讀爲」等有時不單純是記音的問題，很多時候更牽涉到意義和假借。段玉裁《說文解字

注》云：「凡言讀若者，皆擬其音也。凡傳注言讀爲者，皆易其字也。注經必兼茲二者，故有讀爲，有讀若；讀爲亦言讀曰，讀曰亦言讀如。字書但言其本字本音，故有讀若，無讀爲也。」（卷一，示部「稟」字下）大概「讀若」多用於注音，其他則兼注意義或假借，讀者要特別留意。明本闕名撰的《九經直音》可以說是以直音記音的代表作，但真正可用的直音有限，故記音時多加注聲調或反切以爲補救。現在香港中、小學的師生仍然多用直音記音，其實這是不科學的辦法，而且容易誤記誤讀，必須早日推廣粵語音標教學，才能徹底解決問題。

反切大概起源於東漢，可能跟梵文拼音學理有關，然而最主要的起因還是因應語言變異現象而自然產生的。其中有順序的反切，也有倒序的反切。《水經注》裏提過一種「索郎酒」，反語爲「桑落」，「桑落」切「索」，「落桑」切「郎」。南北朝時代還有很多這種「雙反」的例子，日僧空海（原名遍照金剛，法號弘法大師；774 - 835）的《文鏡秘府論》即有一套教人反切調聲和調韻的簡便辦法。例如：

酒 精
盈 酉

用法是「精酉」切「酒」，「酉精」切「盈」，「酒盈」切「精」，「盈酒」切「酉」，兩兩相拼，即可切得所要讀的字，十分簡便，亦不難練習。其他各組調聲韻的例子尚多，有興趣的不妨自行練習。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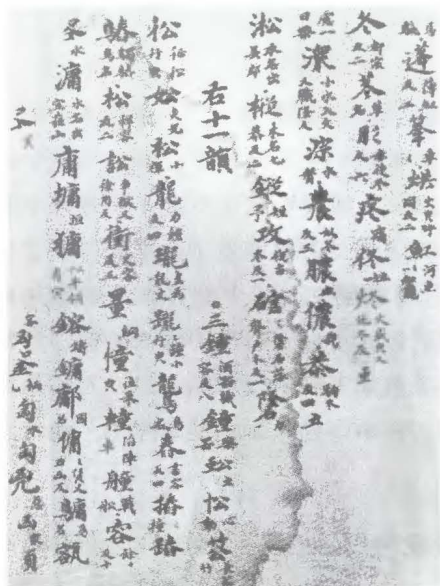
1. 表 風 2. 外 月 3. 琴 奇 4. 天 土
豐 小 厥 膽 羈 今 陽 烟

反切或稱「反」，或稱「切」；反是反覆，切是切摩，取其反覆切摩以成音之意。反切在歷代均有改良，因而沿用至清末，歷時一千多年，是傳統漢字裏一種最重要的記音方法。反切用兩個漢字拼爲一音，反切上下字都有多餘的韻母及聲母存在，例如：

怪，古壞切 guai → g(u) + (h)u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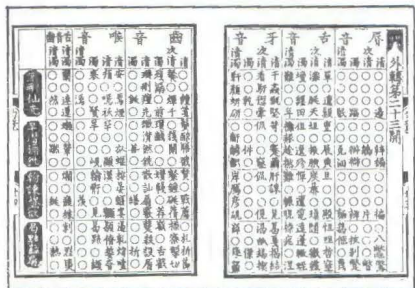
其中括號裏的 u 及 h 都是多餘的音素，這可能導至某些字的切音失準，所以也有很多缺點。加以古今音變這個必然因素，如果不能掌握其演變規律，要切出正確的現代音並不容易，例如「德紅」又怎樣拼出「東」音來呢？（由「德紅」二字切出的音陰陽平，但「東」字現在各地方言都陰平。）可見要懂反切非受相當的訓練不可。

宋代以後，漢唐慣用的譬況讀音、直音、反切等傳統的記音方法已逐漸不能滿足學者的需要，不能不有所創新。由於唐代的聲韻學者已掌握相當高的分析字音的能力，對字母、韻類、介音、元音、韻尾、聲調等都有一定的認識，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於是宋代學者便開始利用等韻圖來記音，其中最著名的有《七音略》、《韻鏡》二書。一般是橫列字母（即聲母，分唇音、舌音、牙音、齒音、喉音、舌齒音等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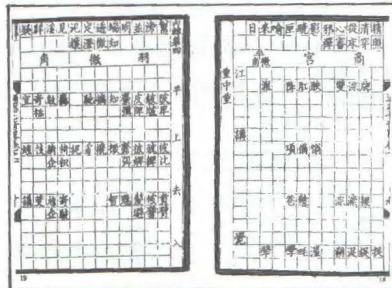


《切韻》殘葉。《切韻》是世界上現存最古的韻書，書中保留了大量古代反切。此圖出自《唐五代韻書集存》頁39。

項），縱分四聲，每個聲調再分四等，再合為一「轉」，製成若干圖表，把韻書中的字分別填入，所有的字音都可以在縱橫交錯的關係中拼得。只要掌握有限的聲母、韻母，即可輕易拼得所要的讀音，比起《切韻》要用大量的反切上字、反切下字等來說，這已是很大的進步了。其後有些韻圖更直接描寫當時的語言或各地方音，現在傳世的大量韻圖實在可以說是研究宋、元、明、清等近代語音的最佳材料，值得珍視。



《韻鏡》書影，據藝文印書館《等韻五種》。



《通志·七音略》書影，據藝文印書館《等韻五種》。

明代中葉以後，中西交往頻繁，外國人學習中國語文，自然會用羅馬字來記音。程君房《程氏墨苑》中載有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1552 - 1610）用羅馬字注音的文章四篇，後由教會單獨印行，取名《西字奇跡》（*Wonder of Western Writing*, 1605）；這大概是傳世最早的羅馬字記音材料了。其後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1577 - 1628）又在利瑪竇等人的基礎上寫成一部完整的羅馬字注音專書《西儒耳目資》（*A Help to Western Scholars*, 1626）。金尼閣的羅馬注音方案只用了25個字母（輔音20，元音5）和5個表示聲調的符號，就可以拼出當時全部的官話音節了，比傳統的反切更加方便易學。方以智（1611 - 1671）《通雅》說：「辯之者曰：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者，因音而成

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卷一）其子方中履《切字釋疑》亦云：「泰西入中國，立字母（即 25 字母），即以父母爲切響而翻字無漏，何其便乎？」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稱方以智有「創造拼音文字之議」，羅常培《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一文亦稱是「大膽的漢字革命論」，其實這都是方以智受了金尼閣等的啓發而產生的聯想。可見利用西方的音標去記音，只要掌握三、四十個音標符號就夠用了，這是最精確便捷的記音方法，可以補救反切記音的不足。可惜中國人的保守性較強，雖經方以智提倡，惟此法一直未見推廣。到了清末王照的《官話字母》及勞乃宣的《簡字譜》等以救亡爲用，形成了聲勢巨大的切音字運動，才能推展開來，通行南北各省。

民國以後，爲了推廣國語教學，記音的工作受到相當重視。1918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頒佈「注音字母」，或稱「國音字母」，1930 起改稱爲「注音符號」；所用的符號如ㄅ、ㄆ、ㄇ、ㄋ等乃依古文篆籀逕省之形而製定，保持一些漢語文傳統的風格，現在仍通行於臺灣地區。此外 1928 年公佈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則是第一個法定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1986 年修訂爲「國語注音符號第二式」。至於國際上通行已久的中文拼音方案則有「威妥瑪式拼音」（Wade - Giles Spelling System, 1859）和「耶魯方案」（Yale Spelling System, 1943）等。

1958 年公佈的「漢語拼音方案」直接用 26 拉丁字母組合成 21 個聲母及 38 個韻母，易於掌握，方便實用，可以作爲統一記音、正詞（用漢語拼音字母拼寫普通話詞語）的標準。現已通行全國，很多海外地區也樂於採用。1982 年國際標準化組織承認爲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那麼「香港」的正確拼寫當爲 Xianggang，北京當爲 Beijing，而不是我們所慣用的英語拼寫 Hong Kong 和 Peking 了。

漢字記音是我國語言工作者長期思考的一道難題。反切雖然有一定的科學價值，卻不便使用；其後想到用字母來記音，然而字母形式問題則又使人徘徊於漢字式字母和拉丁字母之間，不易抉擇。例如最早倡議拼音化運動的盧懋章和王照都曾爲這個形式問題而煩惱過，最後還是傾向於漢字式字母，以便保留若干民族風格。「注音符號」也是在這種心理基調下取得了法定的地位，但對於對外推廣及配合打字機的使用等方面來說，漢字式字母始終比不上拉丁字母方便。所以台灣在推行「注音符號」之餘，也得另外準備一套「國語注音符號第二式」，無論中外人士都得學習兩套符號，實在不方便。「漢語拼音方案」能獲得大多數人的接受，應該有它的優點，也是大勢所趨了。一套符號即能通行於四海學習漢語的領域裏，自然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漢語拼音方案」不但用作學習漢語的主要工具，同時也深入我們的生活之中，無論字典、詞典的注音，人名地名的拼寫，各種產品的名字標記，以至用於視覺通信和無線電報等，都可以用這套拉丁字來拼寫。漢字的記音歷史到此大概也有了一個終極取向，「拼音方案」將引導漢語步入世界的舞臺中去。